

孟子直解

徐洪兴◎撰



孟子直解

徐洪兴 撰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直解/徐洪兴撰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4. 1
ISBN 7-309-03744-8

I. 孟… II. 徐… III. ①儒家②孟子-注释 IV. B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8868 号

孟子直解

徐洪兴 撰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

86-21-65118853(发行部) 86-21-65109143(邮购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
责任编辑 陈士强

装帧设计 孙 曙

总 编 辑 高若海

出 品 人 贺圣遂

印 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270 千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3 000

书 号 ISBN 7-309-03744-8/B·205

定 价 2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中国文化名著《孟子》全本的今注、今译及评析。内容包括：(1)解题。勾勒《孟子》七篇中每一篇的主题思想及主要内容。(2)原文。分章摘录，并加以标点。(3)今译。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，将每章用现代汉语加以直译。(4)注释。用简洁的语言，对原文中难以理解的字、词、句进行解释。(5)评析。在综合古今注家的基础上，对各章的意旨做出评析；适当提示各章的历史和文化背景；择善介绍古今研究者的观点，同时参以作者本人的一些领会或见解。全书资料翔实，文句流畅，通俗易懂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，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古籍读本。

前 言

在旧时的中国,孟子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,而《孟子》也可说是读书人自幼起就必读的书。这里我们就先说说孟子其人、其书吧。

一、孟子其人其书

孟子名轲,战国中期邹(今山东邹县)人。孟子的生卒之年,学术界历来有许多说法。据统计,光孟子的生年之说就有九种之多,然后又由于各种推算的不同,以及对他寿数的说法不同,可衍生出更多关于孟子卒年之说。这里仅取一种相对通行的说法,即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,卒于约公元前289年。

古人除名之外又有字。关于孟子的字,《孟子》书中未提,西汉的司马迁在其《史记》中也无记载。到东汉末的赵岐,他在注解《孟子》时就更不清楚了,只能说孟子“名轲,字则未闻也”(《孟子题辞》)。但从魏晋开始,突然冒出孟子字“子车”、“子舆”或“子居”的几种说法,由于这些说法晚出,且其中有的又是公认的“伪书”,所以学界对其说持不以为然态度者居多。

孟子的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,后来家道衰微,从鲁国迁居邹国。据说孟子幼年丧父,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。孟母的管束甚严,世传有孟母“迁地教子”、“断机训子”、“烹豚存教”等故事,其说虽不一定可靠,但却也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,是后世母仪之典范。

孟子的师承关系不十分清楚。司马迁说他“受业于子思之门人”,但“子思门人”是哪位?缺乏进一步的说明。从中唐韩愈开始,不少儒家学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,子思的老师是曾参,此说虽然后来流传甚广,但没有确切证据,所以也有部分学者不同意。孟子自己曾说过: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,予私淑诸人也。”(《离娄下》)^①这里“诸人”是谁?不知道,或可能是“子思之门人”吧。而所谓“私淑”,按一般的理解,是指敬仰某人的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为其弟子的说法。因此,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,我们无法断定。

但不管怎样,有两点似无可怀疑:其一,孟子是儒家学派中人。孟子一生服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,认为“自生民以来,未有盛于孔子也”(《公孙丑上》),并以一生学习孔子为志愿,说:“乃所愿,则学孔子也”(同上)。其二,孟子确与战国儒学中子思一派关系颇深,这可从《孟子》书中及战国儒家对孟子的评价中看出:首先,在《孟子》书中曾多次引述子思的言论,同时也多次引述传为子思老师曾子的言论,可以说除孔子外,《孟子》书中引前儒之言以子思、曾子为多;其次,《孟子》书中有不少思想与传为子思所作的《中庸》有密切关联,如论“诚”等;再次,与孟

^① 本书中凡引《孟子》语者,书名省略,仅列篇名。

子生活时间相去很近的荀子^①，在其论衡当时诸家之学时，明确把子思和孟子作为一派并提，所谓“子思唱之，孟轲和之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，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殿军，应该对思孟间的关联比较清楚。所以，说孟子是子思思想的传人，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。

孟子的生平经历，与其崇敬的孔子有颇多相似之处，这主要表现在：一、与孔子一样，他也长期开门授徒，即使在游历诸国时，学生们还是伴随其左右；二、与孔子一样，他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，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，因此中年开始他也周游列国游说，而“仆仆于道路”的结果和孔子也差不多，没有哪位国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张；三、与孔子一样，晚年时孟子也退居故里，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、著书立说。这里我简单叙述一下孟子以上三方面的情况：

孟子曾说过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地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！”（《尽心上》）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强调句式即前后的复句，来强调从事教育之“乐”，说明他把从事教育看得比称王天下还要有价值，看来他确实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慰藉。由于长期从事教育，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“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”那么多，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。如他在游历齐国时，已经是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这所“从”“数百

^① 按较通行的说法，孟子约卒于公元前289年，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，那么孟子卒时，荀子已二十四岁。

人”，都是他的学生。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，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。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乐正子、万章、公孙丑、公都子、陈臻、充虞、咸丘蒙、陈代、彭更、屋庐子、桃应、徐辟、孟仲子等十几人，他们都见于《孟子》中。后世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和考证，但其结论未被学界普遍接受，而所增人数也实在有限，所以不提也罢。

孟子中年开始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，从事政治活动，历时二十多年。关于孟子的游历活动，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，学者们的考证更是不少，远的就不说了，如元代的程复心，明代的陈士远，清代的阎若璩、周广业、魏源、张宗泰、崔述，近人钱穆、罗根泽、杨伯峻等的研究，可谓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所以，我不想用那些复杂的考证来困扰读者了，这里仅笼统叙述一下孟子的游历。

大致说来，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。在此之前，他或已有了短暂在邹从政的经历。孟子的游历，到过齐、宋、薛、鲁、滕、梁（魏）等国，其间还曾返回过邹国。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有的仅是路过，有的则去过数次，旅居时间也较长。其中，去过次数最多、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。孟子所以屡次游齐，并在那里的时间最长，有各种解释。较合理的推想不外三点：一、当时齐国（威王、宣王统治时期）是“战国七雄”中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尤其是公元前341年（齐威王十六年）齐国在著名的“马陵之战”中，用孙臆之计，大败魏军，俘杀魏太子申，迫使魏将庞涓自杀。此战不仅使同为“战国七雄”之一的魏国势力从此衰落，也使齐国成为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。孟子就是在此时游历齐国的，如果他的政治主张能被采纳，则推行于

天下显然要比一般的小国容易得多,因此孟子多次赴齐及在齐留滞时间最长是可以理解的。二、当时齐国又是思想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。威、宣之际,是齐国“稷下学宫”的鼎盛期。当时的稷下学宫容纳了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学派,如道、儒、法、名、兵、农、阴阳、轻重、纵横诸家。而汇集的天下贤士最多时达千人以上,其中不乏名流,如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接予、季真、环渊、彭蒙、宋钐、尹文、田巴、倪说、鲁仲连、邹奭,及稍后的荀子等。而孟子也是当时稷下学宫中的著名学者之一,尽管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。在稷下学宫中,无论学术派别、思想观点、政治倾向,包括国别、年龄、资历等,都可以自由发挥观点,战国时期所谓“百家争鸣”之真正体现,以这里为最典型。孟子之所以在齐游历时间最长,这点无疑也是重要因素。事实上,从孟子的整个思想来看,可说他既吸收诸家思想,又批判诸家思想,这是齐国稷下学宫为他提供的条件。三、从功利立场来说,齐宣王时,孟子已成为当时稷下学宫所谓“不治而议论”(《史记·田敬仲完列传》)、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(《盐铁论·论儒》)的“上大夫”(也称“卿”),这或也是孟子居齐时久的原因吧?当然,这只是一般条件而非必要条件,当齐宣王使孟子很失望时,即使宣王想在国都临淄建一居所、又附赠很多钱财(“万钟”),想以此作为其优礼天下士大夫的典范,结果还是遭到了孟子的断然拒绝(事见《公孙丑下》)。

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所提的政治主张,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,那就是主张“王道”而反对“霸道”,反复申论“仁政”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。孟子在其游说中提出:“仁政”源于先王的“不忍人之心”,而从正经界、划井田开始,其中包括了“省刑罚,

薄税敛，深耕易耨”等内容；他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“恒产”（土地），能安居乐业，老人们能衣帛食肉，进而再使年轻人受到道德教育；在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中，“民”具有关键意义，其地位高于国家，更高于君王，所以君王必须能安民、养民和保民；如果能做到这样，那么即使是弱国、小国，国君即使是好勇、好货、好色之徒，即使用木棒为武器，也可以打败秦、楚这种有“坚甲利兵”的强国、大国；就可以使其军队成为“王者之师”，别国的人民就会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”。

孟子在诸国颇受各国君主的优礼，明显要比当年的孔子来得幸运，这也与当时各国普遍有“礼贤下士”的风气有关。孟子在游说时，常慷慨陈词，咄咄逼人，摆出一副“说大人则藐之”的架势，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，只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究实际功利的人，他们都崇尚霸道，大国热衷于如何兼并，小国则关心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。所以孟子那些陈意很高的理想，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是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如司马迁所说：“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

经过这么多年的东奔西走、四处碰壁后，孟子最终明白，那些诸侯国君主虽然在“重士”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，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主张，他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的理想是难以实现了。到这种境地，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，放弃从政愿望，回归故里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，著书立说，希望通过这种形式，把自己的思想传于后世。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

的《孟子》这部著作。

有关《孟子》这部书的作者、篇数，也有不同意见。关于作者，按司马迁的说法，主要是由孟子自著，而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参与其事；按赵岐、朱熹、焦循等的观点，认为是孟子自著；而韩愈、苏辙、晁公武等的意见则认为是弟子万章、公孙丑之徒的追记。就目前学术界的看法，较多是采取司马迁的说法。至于篇数，司马迁说“作《孟子》七篇”，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却著录“《孟子》十一篇”。现存最早的《孟子》注作者赵岐，分《孟子》为“内书”七篇，“外书”四篇，并提出：《性善辨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为政》四篇“外书”，“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，似非《孟子》本真，后世依放而托也。”所以他不予作注。以后这四篇《外书》亡佚了。今存的“外书”，学术界公认为明代人的伪作。

今存的《孟子》一书共七篇，篇目依次是：梁惠王、公孙丑、滕文公、离娄、万章、告子、尽心。每篇各分上下，共 261 章（有的分为 260 章）。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前几个字，没有特定含义。篇目的排列顺序，按赵岐的说法则有特定含义：“孟子以为圣王之盛，惟有尧舜。尧舜之道，仁义为上，故以梁惠王问利国，对以仁义，为首篇也。仁义根心，然后可以大行其政，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、晏之政，答以曾西之所羞也。政莫美于反古之道也，滕文公乐反古，故次之以文公为世子，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。奉礼之谓明，明莫甚于离娄，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。明者当明其行，行莫大于孝，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。孝道之本，在于情性，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。情性在内而主于心，故次以尽心也；尽己之心，与天道通，道之极也，是以终于尽心也。”（《孟子篇叙》）

二、孟子升格过程

历史上有一种通行观点：孔子后“儒分为八”，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。一支始于子夏，讲文献之学，数传至荀子；一支始于曾参，究义理之学，二传至孟子。以后，荀子便是汉代经学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先师，孟子则成为两宋起道学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。儒家内部这两派的分野，也就是所谓“学统”与“道统”之别，“汉学”与“宋学”之分。对这个说法，学界历来意见不同，这里不必细究。此说至少有一点不错，即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确是从两宋开始凸显的。这以后，“孔孟之道”几乎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。

孟子去世后，由他为代表的儒家中的一派似无太大发展。到战国晚期，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渐露头角。荀子稍晚于孟子，他长期居齐，因学问博洽，三次出任“稷下学宫”的“祭酒”。他精通多种儒经，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。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中，对子思、孟子一派有严厉的批评，说他们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犹然而材剧志大，闻见博杂。案往旧造说，谓之五行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。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：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”荀子的批评只能说是当时儒家内部的派别斗争。

秦汉以降至两宋以前，孟子地位一直不高。孟子其人，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；孟子其书，只能归入“子部”一类。在官私文献中，多是“周孔”或“孔颜”并提，鲜见有“孔孟”合称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东汉赵岐在注解《孟子》时，曾把孟子尊为“亚

圣”，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《孟子》的“传记博士”。可“亚圣”之名，未被宋朝以前的官方认可过；而“传记博士”即使存在过也为时很短，且不说此事因不见于《史》、《汉》记载而颇启后人疑窦。当时，也有人批评孟子，最典型的是东汉的王充，他在《论衡》中专立了《刺孟》一篇，列举了孟子八个方面加以批评。唐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，争论国子学当祭“周孔”还是“孔颜”时；唐太宗时，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时；唐玄宗封颜渊为“亚圣”和“兖国公”，封“孔门十哲”和“七十子”为侯、伯时；孟子都只字未被提及。当时科举考试的“明经”科目中只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这“九经”，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被列入“兼通”，而《孟子》一书没有资格入选。

但从中唐起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渐渐地，孟子之名被厕于孔子之后，成为仅次于孔子的“贤人”；孟子其人被政府封了爵号，从祀孔庙；孟子其书被增入儒经之列，悬为科举功令，不久又超越“五经”而跻身于“四书”，变成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。这个变化过程，就是历史上的“孟子升格运动”^①。

变化最早出现在唐代宗宝应二年（763年），礼部侍郎杨绾上疏，建议把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列为一“兼经”，增为“明经”科目。此事虽未见允，但却开启了《孟子》由“子”升“经”的先声。

^① 有关这个过程，其中因需考证的内容很多，注释也太多，这里一般就不具体出注，详细注释可参看拙作《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》一文，载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5期。

真正揭开孟子升格序幕的是韩愈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首次提出儒家“道统”，并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，与那些“古圣先王”相提并论。韩愈以尊“孔孟”取代唐初的尊“孔颜”，在当时学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。如唐末的皮日休，他于唐懿宗咸通四年（863年）上书朝廷，建议将《孟子》作为国家“明经”考试的单独一经。但韩、皮之说只是少数人的呼吁，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。

赵宋立国伊始，承袭唐代旧制，国子监所祭仍为“孔颜”，明经取士仍考“九经”。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重视孟子其人其书只有柳开和孙奭。柳开受皮日休影响，十分推崇孟子，但影响不大；孙奭乃三朝宿儒，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曾受命校勘《孟子》，由此“请以孟轲书镂板”，并撰成《孟子音义》二卷。

孟子升格被重新唤起，是在宋仁宗庆历之际。当时学坛上出现了一股社会思潮，而“尊孟”也成为思潮的取向之一。庆历思潮的领袖人物是范仲淹和欧阳修，他们都属于“尊孟”一派。如范仲淹发挥孟子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的思想，标举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宋代新儒家的理想人格风范。欧阳修推尊孟子，认为“孔子之后，唯孟子最知道”。当时最推崇孟子的是孙复、石介师徒，他们反复强调儒家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到孟子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这样一个圣贤相续的“道统”。他俩作为北宋前期首出的经学家和教育家，在当时学术界有很大影响。在思想界出现“尊孟”的同时，实质性“尊孟”的行动也开始出现，那就是山东兖州邹县孟庙的建立。宋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年），出知兖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，在邹县建成孟庙，以公孙丑、万章等配享，还专请孙复为此事写了

记文。

自庆历以后,孟子升格进入了迅速发展期,到了宋神宗的熙宁、元丰年间(1068—1085年)达到高潮。当时,二程的“洛学”、张载的“关学”及王安石的“新学”,尽管政见相左,却都属于“尊孟”之列的。二程兄弟及张载尊孟的言论很多,后来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之所以会把“四书”单独拿出来作“集注”,明显受到了二程和张载的影响,这方面的资料在他们的文集中随处可见,不必一一引证了。我们主要来谈谈不太为人注意的王安石。

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,他把孟子引为自己的千古知己,把成为孟子式的人物当作人生的目标。王安石之“尊孟”是时人公认的,其弟子陆佃评价乃师曰:“言为《诗》、《书》,行则孔、孟。”其政敌司马光也说他:“介甫于诸书无不观,而特好孟子、老子之言”。王安石之学得力于孟子,故其治《孟子》一书亦勤,有《孟子解》十四卷,今已佚。其“新学”一派中人对《孟子》也多有钻研。王安石一派由于掌握着当时的国家权力,所以在行动上将“尊孟”积极付诸实践。孟子升格此时在政治上已获得朝廷支持,请看下列进展:

熙宁四年(1071年)二月,《孟子》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。

熙宁七年(1074年),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经学家常秩,请立孟轲像于朝廷。

元丰六年(1083年)十月,孟子首次受到官方的封爵,诏封为“邹国公”。

元丰七年(1084年)五月,官方首次批准,允许孟子配享孔庙。

政和五年(1115年),政府方面承认兖州邹县所建的孟庙,诏以乐正子配享、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。

宣和年间(1119—1125年),《孟子》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,成为“十三经”之一。

在上列事实中,熙宁间为王安石当政期间,元丰间王安石虽已经退隐,但执政者蔡确、章惇等均为“新党”中要人,故一向诋诮王安石的朱熹,也不得不承认“孟子配享,乃荆公请之”;政和至宣和间是蔡京当国,亦号称行“新法”。因此,王安石及其“新党”,实在堪称孟子升格运动中之功臣。

宋室南渡以后,孟子升格已进入尾声。当时,王安石“新学”尽管遭到排斥,但“尊孟”取向却为统治者全盘接受。到宋宁宗嘉定五年(1212),国子司业刘燾奏准将朱熹的《论语孟子集注》作为官方之学。差不多同时,目录学家陈振孙撰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正式从目录学上把《孟子》一书由“子部”升格至“经部”。至此为止,孟子升格运动已告基本完成。到元朝的至顺元年(1330年)元文宗加封孟子为“亚圣公”,这可说是整个孟子升格运动的句号。

唐宋间的这场孟子升格运动,不是偶然事件。从本质上看,它是适应当时中国统治思想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,易言之,也就是中国近古时代思想文化大整合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唐宋间思想家所以选择孟子作为儒学更新实践的重要内容,是因为孟子的思想中有他们需要的东西,即孟子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特点,与当时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。概言之,这些特点包括了道统论、辟异端、谈心性、辨王霸诸方面。

当然,孟子升格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其间出现了不少逆

向的言行,即删孟、议孟、疑孟、辩孟、黜孟乃至诋孟的思想倾向。举其重要者言之,如唐末林慎思作《续孟子》,把《孟子》中他以为不是孟子“原意”的内容加以改写。北宋庆历之际的李觏作《常语》,提出孟子不续“道统”、孟子背叛孔子、孟子怀疑六经、孟子不尊王,反对孟子的性善论、反对孟子排斥功利。李觏的学生陈次公、傅野等则附和乃师之说。北宋熙丰之际,司马光著《疑孟》,对孟子加以批评。司马光的“疑孟”,从政治上讲,目的是攻击王安石变法;从学术上讲,是因为他信奉西汉扬雄的思想。司马光的门人晁说之著《儒言》,反对孟子的态度较其师更激烈,而矛头所指也是王安石。他公开上疏,反对当时立《孟子》于学科。南宋初的郑厚作《艺圃折衷》,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,极尽诟骂之能事,说孟子是借孔子思想而“卖仁义”。南宋中期的叶适,在其《习学纪言序目》中,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反对当时的尊孟风气,他否定孟子一系独传“道统”,批评孟子专言心性,批评孟子不切实际的政治思想等。认为孟子身上存在着四个毛病,“开德广,语治骤,处己过,涉世疏”。

以上诸人的反孟言行,由于不适应时代潮流,所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。倒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曾掀起过一点反孟的小浪。作为绝对专制独裁的封建君主,朱元璋对孟子“民贵君轻”的思想十分反感,开始想罢去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,后在大臣冒死进谏下只能作罢。但他却下令删除《孟子》书“激进”的话共八十五条,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孟子节文》的书,规定科举考试不能出现已被删掉的文字^①。但即便权倾一时的皇帝,也

① 详可参阅容肇祖《明太祖的〈孟子节文〉》,《容肇祖集》齐鲁书社1989年版。